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创办 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探索^{*}

张晓萌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孕育了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开启了我国独立自主探索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包括政治理论教育、统一战线教育、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在内的办学实践，形成了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党在延安时期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经验，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 中国共产党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张晓萌（198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孕育了党领导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艰苦奋斗的重要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此背景下，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开启了我国独立自主探索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建立并实现了蓬勃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中回顾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探索，对于深化认识党领导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不断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坐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初期就开始探索创办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教育机构，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干部学校开创了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先河，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创立并实现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开创新中国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18XNA016）的阶段性成果。

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时期

从建党初期到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创办教育机构的初步探索期。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作为“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①，党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干部教育相结合。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此后，党陆续开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等，并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建立起各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同时教育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保证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摆脱根据地文化落后的状态，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中央苏区时期，党确立了“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文化教育总方针^②。为造就大批领导革命斗争的高级干部，党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党校的前身），积累了自主创办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从建党初期到中央苏区时期，党在实践层面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学校的办学成绩就是党从具体的革命环境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的成果。然而，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深入，1931年开始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1934年长征开始后，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干部和学员组成了“干部团”，其他教育机构则由于没有稳定的办学环境而未能继续开办。总体上看，党领导创办的干部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了重要进展，构成了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但由于此时创办的学校仍属于干部培训性质，尚不具备高等院校的属性，加上党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存在时间较短，在实行战略转移后被迫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客观上制约了这一阶段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开端时期

延安时期是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领导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时期。自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并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不指名地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任务，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以及面向全党的号召，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将这片文化教育的荒漠改造成成为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需要，毛泽东强调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

②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大批的抗日干部”^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实现了迅速发展，相继成立了从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发展而来的抗日军政大学，旨在“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②的陕北公学，旨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结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鲁迅艺术学院，旨在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党政干部、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马列学院，旨在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做实际工作的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以及之后合并的华北联合大学、改组而成的自然科学学院，还有新设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这一时期，党面向干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开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等教育，教学内容覆盖军事、政治、自然科学、农业等各专业领域。在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开创了党组（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了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创立了教学与研究一体化的研究室制度，形成了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优良学风，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3.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逐步迈入正规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发展轨道。尽管此时“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已经式微，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已经确立，但是抗战初期对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认识和“左”倾的政治路线仍然阻碍着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如何彻底肃清“左”和右的主观主义错误，进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此时摆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为此，全党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以更好地认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识别“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假马克思主义”^③。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41年12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要求纠正高校在“正规化”办学的初期探索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正规化的办学举措^④。这一时期，“为了精简机构，以及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使高等教育正规化，积累高等教育的经验”^⑤，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⑥，设有三个学院和两个专修科系，建立起正规学制，向综合性的新型高校方向发展。

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解放日报》于4月发表社论，号召教育工作者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制定一套新制度、新课程、新办法，经过两次合并后的延安大学组建起来，被吴玉章称作“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⑦。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大在张家口恢复和扩大，逐步实现了正规化办学。在华北联大的基础上，1948年8月合并成立的华北大学直接成为新中国红色高等院校的摇篮^⑧。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院校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善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教学体系，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于办学治校全过程，极大地推动了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

①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

② 莫岳云等：《李维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页。

④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抗日战争时期（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23页。

⑥ 由陕北公学（后期）、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

⑦ 《延安大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⑧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正式成立，成为“解放区最高学府”。1950年10月，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刘少奇指出，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例子来办”。

二、延安时期新型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包括政治理论教育、统一战线教育、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在内的办学实践。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院校办学实践积累了开展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丰富历史经验，并在办学实践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教育

延安时期，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求学，鉴于这些学员的背景、职业和文化程度不同，革命觉悟水平参差不齐，党办高等院校将转变学员的思想认识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开展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学员的观念，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学员的理想信念。陕北公学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实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教学安排，在普通班开设“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使许多学员“第一次听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道理，认识到中国革命青年的使命不仅要求得民族解放，而且要求得社会解放，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高级班开设了“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范围更广、内容更深的课程，使学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①。

领导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需要有革命的理论。作为“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马列学院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课程，并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著作。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和校长张闻天也经常为学员授课或作专题讲演，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在马列学院所作报告的内容^②。通过学习和研究，学员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加强了自身的党性锻炼和修养。

华北联大一贯重视在全校开设政治理论课教育，由校部直属的政治研究室承担，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员的头脑，“给学生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观念，树立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信心，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通过革命历史，了解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创立新中国”^③。延安大学也高度重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最初开设的“中国革命问题”“革命文选”“时事教育”等课程占用的时间一度高达全部学习时间的2/3^④。毛泽东非常关心延安大学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1944年5月明确提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包括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及思想问题三个部分，为在高等院校普遍推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方向^⑤，有力地推动了高等院校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先锋的实践。

①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8页。

② 参见《永远的丰碑》（十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0-91页。

③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④ 《延安大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⑤ 参见《延安大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82页。

2. 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①。延安时期，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党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团结和教育从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学生，在干部和群众中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为延安时期党在高等院校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对革命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全民族解放奠定基础。陕北公学就是一所典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毛泽东每次到校讲演都会涉及统一战线的内容，学校开设了由邵式平、何干之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程，内容包括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学员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坚定了抗战的必胜信念，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③

为了在办学过程中贯彻统一战线的原则，陕北公学广泛吸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信仰的爱国青年，以马列主义教育和革命教育引导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④。其中，来自国统区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中学生是党团结和统战的重要力量，由于国民党想方设法截留和阻拦前往延安求学的青年，党中央决定在关中地区创办陕北公学分校，以便更顺利地接纳来自国统区的优秀爱国青年。同时，陕北公学呼吁男女平等，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女性受到旧社会的压迫更为沉重，对革命的期望也更加迫切，学校专门设立了女生队，教授同样的课程，同时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与表演，造就了具有共产主义信仰、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妇女群体，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3.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

通过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思想路线展开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接续转化为现实的过程，通过不断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总结新经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理论形态。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讲演内容基础上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诸多重要著作都贯穿了这一重要思想。

延安时期的党办新型高等院校确立起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办学导向，纠正了过去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注重实质而注重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做法，以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病，让学生领会马列主义实质。以“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⑤。毛泽东曾针对一些高校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强调教育必须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坚持哲学应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经济学要研究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5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

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抗日战争时期（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国经济的特点，政治学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军事学要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①。

在抗日军政大学，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教者所教的不限于空泛的理论与死的课本，而在谋与当前事实联系引证运用起来”^②。在陕北公学，毛泽东曾对毕业同学临别赠言，“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③，这种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贯彻在教学中则体现为强调管理严格、提倡学风宽松，强调民主团结、鼓励教学相长，强调主体意识、实现以人为本。在延安大学的行政学院，首要的教学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实施革命政策教育，实施边区建设各方面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的教育，并把这种教育和边区实际工作经验总结相结合。自然科学院也根据学校的统一精神，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符合自然科学特点的具体规定，即理论课采取讲授形式，以便系统地启发讨论，业务课教学则要联系边区的生产实际以及近期的发展，到实验室和工厂实习，以便养成“自己动手”的能力。

4.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

延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上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并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出发点。党办新型高等院校始终坚持为人民办教育，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和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与工农群众广泛地团结在一起。

延安时期的新型高等院校充分吸纳社会各界人士，陕北公学最初招收的一批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内台湾青年一人）和平、津、京、沪四市”，以及从南洋、越南、朝鲜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④。高校的招生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以及各地党组织、爱国群体、知名人士的支持。毛泽东等曾为陕北公学的招生致电在南方工作的党内领导人，“凡纯洁、坚决、吃苦耐劳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北来入学”，各地党组织与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配合陕北公学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推荐了很多学生^⑤。这一时期，广大知识青年和革命进步群众在延安高等院校中接受教育，陕北大地一时间“云集天下英雄豪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

同时，党在这一时期鼓励学生以革命理论武装根据地群众，组织开展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就在于“唤起民众”，“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⑥。陕北公学开设的“民众运动”主要讲授群众运动知识，包括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以及各项政策、法令等内容，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维汉回忆说，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是军队和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那时我们派些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劳，有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⑦。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学员掌握了动员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并通过向群众宣传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激发起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各界群众建立起“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鼓励民众行使民主权利，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后备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页。

② 舒湮：《边区实录》，上海、香港：国际书店，1941年，第3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④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⑤ 《延安大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50页。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

⑦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09页。

三、延安时期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成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培养造就了一支信仰坚定的革命先锋队，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当代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

1.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培养革命先锋

延安时期，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着力培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以及根据地各方面事业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进行不懈的实践和探索。在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使人民从根本上获得解放，亟须增加抗战力量，以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毛泽东指出要让抗战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向，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①。例如为抗日战争而设立的陕北公学，教育内容主要围绕革命形势和军事斗争展开，当前线特别需要组织民众运动的干部时，学校就加强民众运动课程的分量；国民党搞反共摩擦，统一战线的课程内容也作相应变化^②。同时，在教学中重视军事教育，由经验丰富的红军指战员担任游击战争课程的主讲教员，配合以实战演习，增强了学员的战斗能力和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能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兴办教育与培养人才是延安时期新型高等教育形成的宝贵经验，这也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重要原因。此外，被誉为“革命熔炉”的抗日军政大学也是因其“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而闻名^③。迁址和扩招后的华北联大作为“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④。延安时期，党办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胸怀坦白而不谋私利、为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先锋队，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延安时期，党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大众传播进行了艰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延安时期，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前进。党认识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⑤，必须加紧理论学习和研究。为了正确运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从党中央到各高校都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有组织地学习，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和学校都要建立起学习制度，从而“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⑥，党办新型高等院校因此成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阵地，为加快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平台。整风运动开始后，根据地的高校逐步确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育起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3-34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0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④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5页。

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使高校师生普遍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大批研究、践行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锋。他们中大多成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人奔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在浴血奋战中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有的人前往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培养新的干部，将共产主义和革命进步思想传播出去，推动基层群众的思想解放；还有的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对中国的回应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3.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是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的。”^①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制度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极富开创性的历史探索，为新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理念和制度的确立与发展、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探索开创了新型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陕北公学首次实行党组（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的有机结合。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党对高校的领导作用，确保我国高等教育始终沿着正确办学方向前进，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根本领导制度的实践源头。二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这一时期的高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师生的头脑，开设了系统化的政治理论课，为高校学生转变思想观念、塑造理想信念、提升理论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探索实行了研究室制度。通过研究室（即后来的教研室）的设立，这一时期的高校促进了教学与研究的一体化发展，加快了优质师资队伍的培养，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了科研水平提升，为新中国高等院校普遍实行的教研室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延安时期新型高等院校的教育探索在制度建设方面开了先河，深刻影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力保障了新型高等教育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牢牢坚持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 [2]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
- [3]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 [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 [5] 陕公同学会编辑委员会编：《陕公生活》，重庆等地：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
- [6]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编辑：张 桥）

^①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